

泉州的神明

陈保平

秀，有的愁眉苦脸，有的金刚怒目，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仿佛都刻在这些偶头上了。据说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，台湾来了一些收藏者，把泉州的偶头一扫而光。黄老先生手巧口拙，他把一旁的儿子介绍给我们，说“你们问他吧”。小黄二十多岁，一身休闲装，耳朵上打着闪亮的耳钉，看上去聪敏活泼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跟着父亲做偶头，自己也演木偶。“你也演木偶？”我们很惊奇。“是啊！”他边说边从木偶架上拿起一个小沙弥表演起来。他像跳舞一般摆动着手脚，小沙弥在他身前活蹦乱跳，喜笑颜开。因为寺庙寂寞，小沙弥溜出去寻乐，一路遇到下雨、摔跤、迷路，最后还是回到寺庙。这出叫“小沙弥下山”的经典戏在他手里演得惟妙惟肖。小沙弥被提线牵着，又放飞自我地狂奔下山，这情景让人留下无限遐想。我们问他平时去哪里演出，他说各地都有，前几年还常去台湾。他说，台湾比较多的是布袋木偶。他曾在宜兰收了一个徒弟，教他提线木偶，之前每年都去，今年因疫情没去。他说这些时，父亲一直在旁边憨厚地笑着，俨然主角已成了儿子。此时，小黄正拿着相公木偶给我们表演，那个红脸偶头、大红袍子与剧场旧址看到的戏神一模一样。我们说一起拍个照吧，他捧起戏神，迟疑了一会说：“与戏神一起拍行么？”我们不置可否，他又咕噜了一句：“应该没问题吧？”他抬起手，把戏神郑重地托在身前。可就在快门按下的前一刻，他突然说：“等一会”，飞快转身又把戏神换成了小沙弥，这才露出轻松的笑容。

我们在泉州呆了五天，有个问题一直存在疑惑：现代技术、娱乐这么发达，像提线木偶这类传统艺术还能传承下去吗？临走前一天，我们去拜访了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的几位老先生。那是一间坐落在文庙蔡清祠内的建筑，古色古香，屋里堆满了书刊。三位老人都已七十多岁，两位耳背，其中一位郑先生眼睛也不太好。他们退休后一直在挖掘整理泉州的历史文化。好几年前开始，他们就结伴作实地考察。一大早在办公库房前集合，然后沿着泉州中山路两侧巷道路勘，写了几万字的日记。翻阅他们的记载，泉州的故人往事便跃然纸上。如马坂巷7号是名中医傅若谦宅。当年门首悬有“傅氏医寓三世堂”牌号。傅自学成才，留心收集民间秘方验方、及其疗法。初行医，多为贫苦人诊治，不收诊金。中山南路567-3，门匾“道德世家”，乃慈善家李宏成、佛家居士李开善故居。李宏成以经营竹木起家，为清末民初泉郡巨贾。他笃信佛陀，率全家吃斋念佛，举凡地方赈灾救难，不遗余力。他的曾孙李开善倡言复建了承天寺。他们记录的街巷许多我们都走过，可惜只知其外，不知其内。还有许多小庙，如惠存庙、辅德庙、金刚宫等都是为祭祀英烈而建。据说之前还有杨老令公祠堂。军人为救乡亲们牺牲了，当地老百姓也会为他建个小庙。

“那你们觉得像提线木偶这类文化能延续下去吗？”我们终于还是把问题提了出来。坐在对面的杨先生迟疑了一会，说：“很难吧。”旁边的李先生则微微一笑说：“只要政府重视，应可以的吧。”我又问：“泉州美食、小吃总可传承下去吧？”杨先生笑笑说：“美食中国各地都有啊。”那位郑先生半闭着眼，从头上听听着，没说过一句话。一旁的朋友说他可能听不清。于是，我提高嗓门问：“郑先生，你觉得什么传统可延续下去？”他头一抬，腮帮鼓了一会，突然蹦出两个字：“神明。”“神明？”我们有点惊讶，也有点忽然开悟。旁边两位老先生则频频点头。李先生补充道：“在我们泉州，来个明星没多少人感兴趣，但说明天哪个神来，每家每户凌晨三、四点就起来摆放敬神供品。”“你们都摆吗？”我问。杨先生笑笑说：“我们不摆，家里人摆，一个人摆就等于全家都敬了。”

最后一天，庄老师陪我们去新建的木偶剧场看他们彩排，剧目是《赵氏孤儿》。没想到这个千年古城，至今仍用木偶表演着这出千年古戏。那一幕正是外面杀声四起，公主跪地求救，程婴冒死把婴儿藏入药箱。一束红光投在程婴惊恐、凛然的脸上。我们坐在台下，竟然有点激动。程婴的红脸忽然让我想到了戏神。一瞬间，人、偶、神仿佛融为一体，孰真孰假，难以分辨。

从旧址出来后，我们去了“黄清辉木偶工作室”。黄老先生是泉州雕刻偶头的名师。在木偶界，制作偶头几乎和表演一样，是最见艺术功力的活。他工作室里呈放着的偶头，除了他自己雕刻的，有些比庄老师家的年代更久远。从赵子龙、程婴、钟植到孙悟空，个个栩栩如生。有的眉清目

最近省庐兄简我一枚手绘贺年卡，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龚易图的曾孙女龚世润（1926-2015）画的贺年卡。一面是设色枇杷，另一面书写一首咏枇杷诗。小小的贺卡，精心结撰，一字一画，传达一位名门闺秀的锦绣艺心与诗心。后来这枚贺卡由王孝莹（1904-2007）题签发出。王孝莹，龚礼逸（1902-1965）的夫人，龚世润的母亲，清代状元王仁堪的后代，亦是福州有名的才女。龚礼逸王孝莹夫妇及女儿龚世润同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，一家三口同聘入馆，在福建文史界绝无仅有。一纸贺卡汇集龚家两代才女的丹青墨迹，十分难得。

邮寄贺卡是进入手机时代前人们最常见的拜年方式，借此传递问候，遥寄感念，表达祝福。

整个八十年代是贺卡大流行的年代。每当年将尽一年又来之际，人们涌向书店或百货商店选购贺卡，在上面写上三言两语，以寄远人。贺卡上的字，纪录下那代人的精神风貌，也映照出那代人的朴素情怀，往后手工书写伴随着贺卡形式的转世成为绝响。

那时，我最羡慕那些在新闻出版界的朋友，藉凭工作上的便利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总可以向远方的朋友们遥寄一份写在贺年卡上的问候。而有些有书画专长的朋友也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手工绘制贺卡，成为众多贺卡中的另类。当时只是适应时节的文化用品，到了如今，我们才发觉手绘贺卡的可珍，它们常常是孤品，而且数量偏少。如果碰上贺卡的绘制者是名人，我相信可以把它们当作艺术品看，不仅仅是我们曾经寄托过某些情感与某个时代相关联的物品。

眼前的这枚龚世润诗画相联的小贺卡，当然也是那个时代遗落的一叶踪影，诗画书法隐现一位名门闺秀的文化教养。笔墨安静从容，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。捧在手里反复展观，不由得击节称好。

关于自制贺卡，我听说过同在福州生活的另一位世家公子沈颢寿（1907-1995），逢年过节也热衷于自写吉语，



上图：白蕉夫人金学仪梅花贺卡 下图：龚世润贺卡（正反面）
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会”微信客户端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两个上海人在工作所在地哈尔滨组成了小家庭。妻子要生产了。那天我人在医院待产的妻子那里回来，见家门口放着一只篮子，篮子上盖着一块布，掀开一看，满满一篮鸡蛋——这可是雪中送炭啊！

那时哈尔滨副食供应紧缺，鸡蛋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紧送的呢？提起篮子上下左右寻找，不见只言片语。思来想去，想到了贾宏图。他和我是分别从哈尔滨和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，不久他调到兵团报社当编辑，我在下面团里当新闻干事，因稿件往来成了知心朋友。他长我五岁，是我兄长。后来他调到哈尔滨日报，我调到兵团报社。不久我也调到哈尔滨，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。得知我成家，他送来贺礼，没想到在一条被罩里夹了一本“新婚须知”的科普读物。那个年代这样的读本很少见，新华书店里也难有卖，这无疑和当时受“左”的思潮影响，视谈“性”为“不正经”的观念有关，担心年轻人看这样的读本会产生副作用，这使得不少到了婚龄的人对性知识知之甚少。这本小册子让我感到宏图办事细致务实，连“针对性”也考虑到了。于是给他去了电话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说鸡蛋是从农村亲戚家要来的，新鲜，给弟妹补身子。

伺候月子的事没能按计划进行，上海两家老人一时都实难脱身，彼时社会上还没“月嫂”一说，我们只得自己“扛”了。只是心里没有底，难免有些忐忑。

就在这时，也是从兵团报社调到

分寄给投缘的亲友。甚至福州城里与他打过交道的书画商也能接到他寄的贺卡，分享他的文墨因缘。按今天的说法，这个世家子弟的做法颇接地气，上交下接，平易近人。不妨也可以视为沈先生对粉丝的呵爱，一纸相递，寄予了多少细致的体贴和温暖，难怪沈先生在福州的名气那么大。我们可以称赞沈先生的情商，也可以说，那时的贺年卡在传递人们的情感时，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。

前一阵子，若谷兄送我一本来省予画册。闲来翻阅画集，我看到宋先生生前也画过不少贺年卡，寥寥数笔，风神全出。他当年那么爱画贺年卡那样的小品，想来一个原因是他的手绘贺卡招人喜欢，画家怀有一颗仁心，随意点染，权作笔墨骨肉。衡量一个画家的艺术水平，固然要看大作品，但小品往往更易透露性情。

寒舍藏有白蕉夫人金学仪（1910-2008）的画梅贺卡，也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。据白蕉弟子蒋炳昌回忆，那个时候金先生经常收到各地寄来的贺卡，为报答亲友，已有几十年未动笔的她重拾旧技，画梅为箋，溢而为贺片。原来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金先生就与夫婿白蕉联手以“白兰金梅”应世。荒疏几十年后，稍加练习，画笔犹复旧时风采。大多画在一小方块宣纸上，画成后贴于硬纸板，署名钤印。但见铁骨奇崛，寒蕊孤俏，略施粉黛，笔下的梅花亦见金先生的为人。以贺卡名义出现的寒香图，是这位奇女子留给世人最后的



上图：白蕉夫人金学仪梅花贺卡 下图：龚世润贺卡（正反面）
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会”微信客户端



黑龙江日报社的李惠东来电话，说和妻子王志贤商量好了，她到我家住些天，给我们示范怎样给孩子洗澡、喂奶、喝水、处理屎尿和告知注意的事项等，把我们“扶上马”。真是及时雨啊！我很是感激。在兵团报社时，王志贤常让我们单身汉到她家“搓一顿”，她的贤惠、热情和能干有口皆碑，又带大了两个孩子，有经验。但又不免为李惠东这个“甩手掌柜”担心，因为媳妇样样包办，他坐享其成惯了，养成了“好吃懒做”的“恶习”。想想王志贤不在家，两个上小学的淘气孩子，吃喝拉撒一大堆家务，还要上班编报……我问他：“你能把这些摆平吗？”他豪爽地说：“放心吧，缺了王志贤地球还不转了？保证没问题！”

我这小家的“万事开头难”，就这样被化解了。1985年8月18日是周日。在此前几天，我碰到李惠东，他说你孩子快三岁了，过些天就到星期天了，咱两一家一起到太阳岛玩玩，那里很热闹，孩子们一定喜欢。我说，好啊！说过后，来了采访任务有稿子要赶，去不

了。这一忙乎，忘和惠东打招呼了。18日那天近傍晚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“咚咚”敲响，开门一看是李惠东。正值盛夏，他头上汗津津的，上衣也湿了一片。他朝屋里看了看，问道：“都在家呀？”我说：“都在。快进屋。”他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好！好！在家就好！在家就好！”随即又说：“不进屋了，要赶回去。”“怎么啦？这么急？”我觉得奇怪，不解地问。他这才告知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，松花江上出事啦，就在一个多小时前，从太阳岛回来的客轮翻了，满船的游客都落到江里了，现在正在紧急搜救！前几天我说咱两家到太阳岛去玩，后来单位有事没去，我怕你们去了。现在好了，看到你们放心了。我要赶回去，王志贤还在等信呢！说完，连口水都没喝就匆匆走了。

我和妻子怔住了！他家在道里区，离松花江近，我这里是香坊区，到松花江边有不少路。那时没有桥，到松花江上的太阳岛玩只能坐渡轮去。因隔着距离，渡轮出事我们一点不知道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话，有事只得见面说。李惠东家到我家只有一条公交线路，

祝福声中过新年

——记忆中的80年代手绘贺年卡

唐吟方

一道翰墨奇光。

旅美学人王方宇（1913-1997）那个时候自制的贺卡，乃是一张A4纸，中央以线勾出中式立轴，大约仿自李渔《闲情偶寄》插图的形式，立轴上集曹全写“恭贺新禧”，落款以王先生和夫人沈慧女士的名义。这是海外老一辈华人中国情结的流露。后来这种贺片用完了，我收到过他采用复印件的贺片。就其性质而言，与其说是贺片，倒不如说是贺箋贴切。迢迢相递的一纸，好像又回到了中国旧时文士之间贺箋的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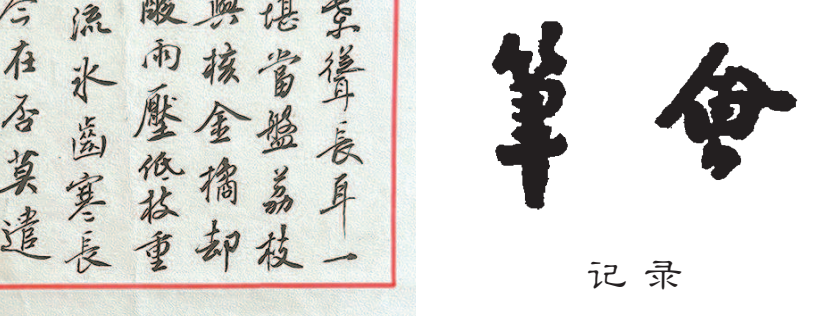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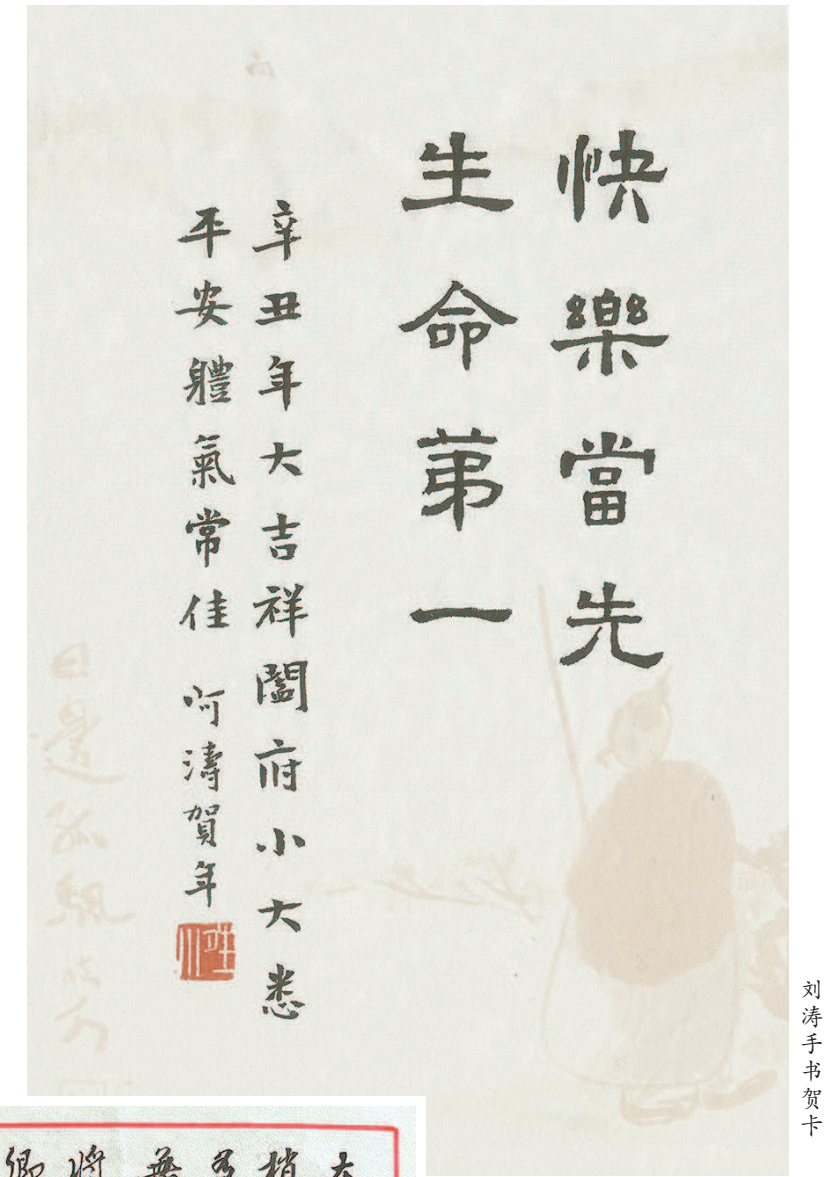
省庐问我今天还有没有人写贺卡，我不清楚整体情况。就我接触到的，艺术史家刘涛先生还保留着老习惯，每年新年来临之际，一定会预留三二日，上琉璃厂购花箋选誊语写贺箋，吉语一二，送出的是祝福，留下的是我们民族

文化的底蕴。

当我们感慨手机带来的便利时，是否想到现代通信工具导致的与过去的隔膜？比如书信，比如更小众的手绘贺卡。今天，每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，手机的软件里也会有“电子贺卡”供人们选用。从形式到贺词，往往华贵气派，只要动一动手指，就会以你的名义出现在亲友面前。我不清楚别人怎样看待这种电子贺卡，从我的内心，是非常拒绝这样的贺卡的。

怀念消逝的贺卡，也许是在乎贺卡背后的那个纯真时代。那时的文化没有那么多“替身”，每个人都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。

2021年8月13日北京北七家双桂书屋



车辆少，路况又不大好，来一趟要花四五十分钟。他牵挂我们，特意赶来看到了我们，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。后来得知，那艘渡轮上238名乘客全部落水，生还67人，遇难171人，酿成了松花江航运史上最严重的灾难。这惨痛的教训，成了哈尔滨人民心头永远的痛。而李惠东那天到我家的情景，也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那些年的春节，我和李惠东的“保留节目”，是和贾宏图一起到他父母家给两位老人拜年，一起吃年夜饭。宏图母亲每次都会张罗满满一桌菜，还特别关照我这个“弟弟”，总是边往我碗里夹菜边说：刚满18岁就离家，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，家里人多挂念啊。宏图是你哥，你就把这里当家。我确实已把这里当家了。记得在兵团报社有出差，火车晚点，到哈尔滨已是深夜近十一点钟，没处可去。宏图父母家离家站近，就“不见外”地去敲门，把睡梦中的宏图母亲敲醒。她见是我，马上腾出床位让我睡。第二天一早，给我下了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上面卧了两个香喷喷的荷包蛋，吃得我心里那个暖！

在哈尔滨十六年后，我调回老家的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。和贾宏图与他父母亲，和李惠东、王志贤夫妇离得远了，但留存心里最柔软处的那些他们给予的暖心事，已将他们的情谊融入了我的精神之中，怎么分得开呢？每每想起，他们就如在眼前，暖暖的感觉便会在周身涌动……

